



關於建設中國社會史* 史料學的思考

The History of Building Chinese Society: Rethinking Historical Materials

馮 爾 康 (Feng Erkang) *

前 言

史料是史學研究的素材，沒有史料，便沒有史學，這是史家共識，毋庸贅言，所以史料學成為歷史學的輔助學科。中國通史有不止一部的史料學專著，如陳高華主編的《中國古代史史料學》，¹ 謝國楨的《史料學概論》；² 斷代史有，如筆者的《清史史料學》；³ 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資料概述》；⁴ 張玉法的《中國現代史史料指引》，⁵ 專史亦有，例如筆者的《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⁶ 但是社會史尚無史料學專著，連專題論文亦難見到，這當然不是說學者對社會史史料毫無研究。錢穆在《如何研究社會史》講演中說到社會史的史料並不缺乏，「正史」中的有關社會史的材料甚為豐富，還有保存在禮制書籍、族譜和氏姓書、方志之中的。⁷ 王家範在《中國歷史通論》一書中對社會史的史

料亦予關注。⁸ 這些著述因為不是專門討論社會史史料問題的，故未作深入具體的論述，建設社會史史料學的事不能要求這些論著。但是社會史研究的進行已開展多年，學者在努力於社會史史料的搜求與運用，成就頗為可觀，這種學術研究的實踐，就為進行社會史史料學的研究創造了基本的條件；我們還應看到圖書文獻的整理出版，特別是地方志文獻、經濟史文獻、敦煌文書、徽學文書、歷史檔案的標點校勘及大量印行，有關載籍的研究介紹，比如家譜、文集、方志的種種目錄學的提要工具書：《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⁹ 《中國家譜綜合目錄》，¹⁰ 柯愈春編《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¹¹ 等，專題內容的資料輯錄有《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彙編》、¹² 蕭一山編著的《近代秘密社會史料》，¹³ 等等，為數可觀。這些情形，令我們知道社會史史料學的探討，並非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有成果可以借鑒。

* 這裏說的社會史，也可以理解為新社會史、新史學，所談的也是新社會史、新史學的史料學建設問題。

* 作者係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現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客座教授。

1 陳高華主編，《中國古代史史料學》，北京出版社，1983年。

2 謝國楨，《史料學概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

3 馮爾康，《清史史料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年。

4 陳恭祿，《中國近代史資料概述》，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

5 張玉法，《中國現代史史料指引》，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2年。

6 馮爾康，《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

7 錢穆，《中國歷史研究法》第三講，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年，頁41-44。

8 王家範，《中國歷史通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9 《中國地方志聯合目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10 《中國家譜綜合目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11 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2 丁世良等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彙編》，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80年代出版。

13 蕭一山編著，《近代秘密社會史料》，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



筆者在《中國社會史研究概述》的導言中闡有社會史史料一節，¹⁴ 另撰〈略述中國古代社會史的史料〉、¹⁵ 〈社會史研究與《二十五史》〉，¹⁶ 我的研究實在膚淺，〈略述〉一文發表雖在晚近，而撰寫於十年前，2001年披露後，甚為慚愧，因未對社會史之史料進行史料學的研究，未能說明那些文獻對社會史的特殊價值以及利用的方法和注意事項，即沒有對社會史史料進行史料學的探討。

什麼是社會史史料，或者說什麼是新社會史、新史學史料，我國有關社會史史料究竟有無多少，處於何種狀況，如何發掘這種材料，它們的史料價值何在，收藏、保存、整理及出版情況又如何，怎樣進行這類史料的利用？我尚未能作出全面的思考，現將有所思索的觀察社會史史料的視野與方法、如何認識傳統史料的社會史價值諸問題，依據同仁研究中使用資料的狀況及個人的研究經驗，提出初步見解，祈請同好指教。

一、新概念、新方向、新領域是打開社會史史料寶藏的鑰匙

我們研治政治史、經濟史，容易知道到那裏去尋覓材料，因為我們有政治史、經濟史的明確概念，知道那一類的書籍裏可能有相關內容的資料。社會史史料到那兒去找？道理是一樣的，應有社會史的概念，明確這是研究何種事情的學問，就可以考慮那一方面的歷史文獻可能會有這方面的資料，當然，由於社會史是較新的學問，研究者還不太熟悉，尋找起來還不會順手，不過已經有了查詢的方向，事情就相對好辦了。同時社會史的研究領域日益拓寬，新概念、新方向、新領域不斷地產生，於是就有了探索其史料的新方向。要之，社會史研究的開展，以及關於它的新概念、新方向、新領域的提出，無不給社會史史料打開新的領域、方向。比如研究社會下層的概念被提出來，方志、族譜、家訓、筆記、

一般士人撰著的文集，便會成為我們查找民眾社會生活史的資料對象，從中可能發現民眾的社會組織、群體生活、社交關係、家庭家族生活、節日生活、宗教信仰、神鬼信仰、秘密結社、風俗習慣、生產方式、經濟狀況、官民關係等方面的素材。又如婦女史、性別史研究方向的出現，各種類型的列女傳記，如《繪畫列女傳》；女性的專書，如《奩史》（係類書）；正史、方志、族譜、文集集中的《列女傳》、《烈女傳》、《貞女傳》、《孝女傳》；筆記中關於女性的載筆，均被開闢為社會史的史料。身體史研究的開展，醫藥類的專書，如《本草綱目》、《傷寒論》等，從社會醫療史的角度加以解讀，同醫家當作專業理論來讀，會索取不同的材料，特別是那些民間驗方：各種《傷寒論》、《千金方》的民間注本，紀錄醫療實踐的經驗，更為社會醫療史的寶貴材料。換句話說，新概念、新方向、新領域的提出，那些蘊藏在正史、政書、方志、文集、筆記、游記等文種圖籍的社會史史料便可能被挖掘出來。楊念群就美國中國學研究中的「概念化」傾向而言，「每一個核心層概念的提出都開拓了新史料來源」，「『中國中心論』範式的提出所引發的地方史研究的浪潮，卻根本改變了史料選擇的範圍和特徵，即開始從中國人自身的感覺和立場出發選擇史料的種類」。¹⁷ 由美國中國學研究的實踐，獲知新概念的提出對新史料選擇的方向性價值。王家範認為社會史研究的提出對於史料講，簡直是一種革命，是將反映下層社會、基層社會的經濟、社會、組織、民風、信仰等內容的資料，不論來自何種文獻，皆可搜集起來。¹⁸ 說得非常精彩。愚意不一定講「史料革命」，而充分注意到社會史研究，賦予歷史文獻新的生命，使它們本來具有的社會史史料被人們所認識，加以索取和利用。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我國各種文體的歷史文獻，蘊藏著大量的社會史史料，研究社會史，不必顧慮史料的缺乏，而在於下功夫利用新概念去尋找。

14 馮爾康等，《中國社會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

15 馮爾康，〈略述中國古代社會史的史料〉，張國剛主編，《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3卷，2001年，北京中華書局。

16 馮爾康，〈社會史研究與《二十五史》〉，天津《歷史教學》，2001年第1期。

17 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範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

18 王家範，《中國歷史通論》，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419。



二、被排除的、不在視野範圍的圖 籍、文書納入社會史史料庫

(一) 文藝作品被有條件地利用作史料

文學藝術作品，有一個時期被嚴格地排除在史料之外，因為它們所反映的不是真人真事，不足以反映歷史的真實。只有極少數史家，敢於利用文學作品的材料研究歷史，如陳寅恪，採取以詩證史的辦法，寫出《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元白詩箋證稿》等名著，這表明文藝作品的內在因素具有史學的史料價值。社會史研究的開展，很自然地令人們注意到文藝作品的這種價值，這是因為：第一，詩賦常常有序言，將它同詩賦本身結合觀看，得以明瞭有關的史事；第二，詩集的編輯，通常是依寫作年代進行的，時間與內容的結合考察，可以幫助我們弄清一些事情；第三，成功的文藝作品，寄托作者的情感、願望，幫助我們瞭解歷史人物的內心活動，有助於人物行為、社會生活及傳記的寫作；第四，通常被人們蔑視的官方的一些賦詩活動及其紀錄，能夠反映缺乏資料的歷史事實的某種側面，故而也可以當作史料來運用；第五，文藝作品對事物的形象反映，可能會促進史家研究的形象思維，有助於理解歷史。

具體地說，文藝作品可能提供的社會史資料，我想有以下幾方面：史詩紀錄社會災異情況下人們的生活和信仰中的無奈求助，如描寫災荒和瘟疫的流行，社首、地保、紳衿組織民眾求神求雨禳災消禍，為此而斂錢，往往不見效果，災民更加痛苦，在張應昌編輯的《清詩鐸》裏收有很多首這一類的詩詞。¹⁹ 小說反映人們具體而生動的生活方式和社會關係，衣食住行，婚嫁喪葬，節日生活，人生喜慶（生日、喬遷、升遷）生活，比如《紅樓夢》描寫各種人穿著服飾，標誌人的社會身分，王夫人責罵奴婢晴雯，誰許你穿紅著綠，打扮得妖精似的，可知衣著是等級身分的標誌。《紅樓夢》中秦可卿給王熙鳳托夢的情節，建議家族建立族學和義田，即使抄家，義產也不沒收，而族學可以培養子弟，總有東山再起的機會，這是那時家族活動的寫真。《紅樓夢》寫探春出面組織海棠詩社，小姐、少奶奶吟詩作樂，如

同社會上文雅士的結社吟詩的社交活動。《紅樓夢》寫劉姥姥的二進大觀園，被人們善意的愚弄，她也知道自家充當的角色，但樂於承擔，她幾乎成為「清客相公」的形象。《紅樓夢》寫眾人湊分子給鳳姐过生日，是大戶人家學小戶人家過生日的法子；《紅樓夢》寫醫家用藥——藥方，研究者視其作者真懂醫學。《紅樓夢》寫薛寶釵論作畫，研究者謂其作者深明畫理。《紅樓夢》寫山子野建造大觀園，研究者云其反映乾隆時代的建築藝術。如此等等，《紅樓夢》成了百科全書，成為反映清代前期社會生活的藝術性資料，可供史家選取。文藝作品寄寓人們的某種理想和政治感情，如員外郎孔尚任的《桃花扇》傳奇，寫明清之際的江南四大公子之一的侯方域與妓女李香君的愛情故事，藉以抨擊南明福王弘光政權的腐敗，此劇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在京城演出，引起轟動，孔尚任也因此丟官，這本身就是生動的社會歷史，而《桃花扇》的上演，正是人們欣賞藝術的文藝生活。文藝作品表現人們的感情生活，也是四大公子之一的如皋冒辟疆寫作〈影梅庵憶語〉，反映與董小宛的愛情故事。有些詩賦看似無聊的遊戲之作，其實也能反映社會上層生活的某種側面，如朝廷舉行《柏梁體》賦詩會，皇帝作首句，王公大臣廣和，每人一句，不過幾個字，卻能反映其人的人品及對這種玩意的態度。每年開春的皇帝親耕耤田禮，過去我們以為這是皇帝走形式，做給百姓看的，沒有意思。有的皇帝確係如此，有的則不然，親耕以前要和大臣一起演習，鄭重其事，連同祭天大禮，祭前皇帝要在齋所齋戒，離開大內，不得親近女色，這些祭祀大典和親耕禮，有時有頌賦的創作，過往我們視之為具文，其實從中亦可窺視皇帝的另一種生活、皇帝的情趣及身體狀況。

(二) 對筆記體著作的史料運用

筆記體的著作，是作者隨筆紀錄所見所聞及閱讀圖書、鑒賞文物心得，或者隨筆撰寫帶有虛構性的人物故事，在古代圖書分類學中屬於「史部·雜史」、「子部·雜家」、「子部·小說家」。它的內容複雜，學者將它們區分為學術類的筆記，怪異（志怪）類的筆記，小說類的筆記，當然學術類的最有史料價值，向來為史家

19 張應昌輯，《清詩鐸》，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所珍視，社會史的研究更使它大放異彩。對於筆記體文獻，不管是那一類的，都有社會史史料的價值，這是因為它提供的資料所反映的社會生活面之廣泛，之深入細緻，之生動形象，為他種文獻所難企及。筆記體著述，只要作者感興趣的，什麼事情都會紀錄（政治上的禁忌除外），所以涉及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各色人等的生活及其觀念，舉凡紳衿職官的逸聞趣事，結社吟詩，九老聚會，朝廷決策的某種細節，民眾運動的發生與觀念，男女關係及女子的異行，優伶的演出與人際關係，宗教信仰，僧尼道士道姑，法事道場，民間秘密結社，秘密宗教，少數民族的社會風情，民族關係，半賤民、賤民社會，賤民與平民的關係，家庭家族生活與人際關係，三教九流，三姑六婆，人生喜慶，變性之人，風俗時尚，飲食、衣著好尚，物價與消費，天象災異，風雷雨雹，賑災救濟，好善團體，等等。

說到細緻，描述事情的細微末節，是生活本身的，而非生活程式化的，基本上沒有各種官修圖書的套語或語焉不詳。如明末清初張岱著《陶庵夢憶》，記說書藝人柳敬亭講述「景陽崗武松打虎」故事，說武松到店內沽酒，無人接待，惱怒得大吼一聲，震動得空缸空瓮瓮作響，聽書人則是「屏息靜坐，傾耳聽之」，將演員的絕技及與聽眾雙方交流的情形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²⁰具體而又有心理活動的描寫，自然將事情、人物寫得生動，讀起來有滋有味，常常會有會心微笑的樂趣。

志怪的內容，有個時期反對迷信，視之為荒誕不經之談。人們對一個時期的認識作出反思之後，知道迷信有之，但更多的是人類對人體自身、對自然界、對社會的某些現象缺乏認識，人體有沒有特異功能，做夢是怎麼回事，星座與人生有無關係，風水有沒有道理，自然界的非常規現象與人間的異事有無因果關係，這等等問題都需要繼續探討，求得科學解答。當生態環境遭到破壞之後，人們懂得「人定勝天」的觀念需要重新思考和解釋了。自然科學解開酸雨之謎以後，歷史文獻中下紅雨的記載，不能再斥之為妄說，那時雖無工業發展造成的酸雨，難道不會有類似的事情發生嗎？古文獻記錄天上掉下水牛，無知時謂為妄言，當有了龍捲風的知識，明白那是龍捲風造成的，古人不懂，以為是天意某種表

示，有迷信成分，但所反映的現象是真實的，基本上不能視之為迷信，如果我們斥之為迷信，那倒證明自家陷入了「反迷信」的迷信之中。所以對志怪小說的「怪」，不應簡單的斥之為迷信，而需要分析其是怎樣的事情，古人對它的說明，或不理解，正表明那時人們的觀念、心態，正是社會史應當研究的內容。好多自然界的現象，人類社會的現象，有待於人類去認知，在這個過程中，不要無知下斷語。有這種態度，可能會較好地認識和利用各種筆記小說的資料，令它能夠說明社會生活史的每個側面。

（三）利用過往不登大雅之堂而流傳於民間的文獻材料

有些圖書、文書在民間社會流傳，文人雅士看不上，官方機構不收集，以致進入近代社會，公共圖書館仍不收藏。民間秘密宗教的經卷，術士的堪輿書，麻衣相士的算命書，江湖郎中的醫術驗方，居家生活的常用書——家庭生活手冊，各種不同抄本、版本的《萬寶全書》，等等。術數之士的書籍、秘密宗教的經卷，同「怪力亂神」有關，當然不能登大雅之堂。《萬寶全書》是很有實用價值的圖書，也被學術界忽視。此外有許多類型的散篇文書，如地契、房契、稅契、分家書、戶由單、合婚書、賣身契、各種合約、過房文書，民人之間經濟往來及人身關係的文書，官民之間的憑信而由民間保存的文書，皆係單篇零散之物，事主注意珍藏，因事關家事，自應祕不示人，不會在市面流傳，而其所反映之事，皆很瑣碎，亦不足以引發好事者的注意。但是時過境遷，即使那些文書已經失去法律上的效用，在古代也無人收集彙編，無從進入書林。上個世紀，有公共圖書館認識到它的學術價值，予以收集，徽州文書就是這樣被發現的，如今乃產生「徽學」。在此以前，敦煌文書的被發現，出現「敦煌學」這樣世界性的學問。敦煌學及其文書、徽學及其文書的引人矚目，是人類學、民族學、史學、文學、宗教學各盡所能的綜合成果，而社會史對這兩種文書的利用，可以說得到它們的實惠，將它們用作重要的材料庫了。

尤為可喜的是，有學者對這類文書進行學術研究，加以評介，以便學者對它們的利用。李世瑜對民間宗教

20 張岱，《陶庵夢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經卷的搜集與研究，寫出專著《寶卷綜錄》，介紹七百七十四種寶卷。²¹ 最早將民間日用類書用於社會生活史、社會文化史領域研究的王爾敏，在《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一書中已廣泛利用這類資料，尤其是涉及四禮規範、書信寫作、契約帖式等專科性民間日用類書，並首先引用《萬寶全書》的資料。²² 王爾敏收入《明清社會文化生態》一書的論文，有不少是利用民間日用類書資料討論平民的生活情節記誦之學、文字遊戲。²³ 王爾敏還撰文介紹民間日用類書《酬世錦囊》——〈《酬世錦囊》之內涵及其適用之人際網路〉。²⁴ 吳蕙芳將《萬寶全書》作為博士學位論文，在臺北、北京、香港、東京、京都、大阪等地，搜集到六十多部不同版本的明清時期民間日用類書，比勘合校，詳細注釋，說明其史料內涵、價值，撰成《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社會實錄》一書，²⁵ 王爾敏為之作序，贊揚她將《萬寶全書》這類「俗鄙史料，排進高深研究殿堂」。²⁶ 那些未能進入學者視野的文書，被發現了，被利用了，是史料學研究的發展。楊念群著文，將那些史料稱為「處於邊緣狀態的史料」。²⁷ 這類文書不妨名之為「處於邊緣狀態的史料文書」。

（四）近當代的散篇文書的成為社會史史料

上面說的是前近代的處於邊緣狀態的史料文書，那麼近代以來的同類或類似性質的文書，也有類似的命運，被學者發現和利用。據說美國學者賀肖研究近代上海妓女史，從導遊手冊、街頭小報、偵訊紀錄諸種文書中，獲得傳統資料所忽視的史料。導遊手冊，應當是旅遊景點、旅館、飯店、娛樂場所（文明的電影院、劇院、博物館，狹邪的色情場所）、交通圖、鐵路、公路、航空運行時刻表等方面的零散資料。街頭小報，包

括各種商業廣告、傳單、傳播社會新聞的存世短暫的小報及雜誌。這類諮詢性的文書，具有極大的實效性，市民及旅遊者看過或使用過之後就會將它們丟棄，很難有人保存這種失去效用的爛紙碎片，學者也不把那些東西當作正經書刊報紙，向不措意，特予收藏，故而難得有人認識、承認它們的學術史料價值。如今社會史的研究者有了「向下看」的視角，尋覓資料，將目光掃向這種文書角落，令它們成為有價值的歷史文獻，真是變廢為寶，化腐朽為神奇了。

（五）視覺材料成為社會史史料

現代社會裏，人們的生活與視覺材料關係密切，觀看電視，幾乎成了每天必有的活動，到博物館、各種展覽館去欣賞科技、天文、繪畫、攝影、雕塑、某種商品（如汽車）等專題內容的展出，到影劇院觀賞電影、戲劇的放映或演出，也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內容。反映、紀錄現代人生活的這些物質的、精神的產品，就進入了社會史史家的眼簾，把它們捕捉為研究素材，這樣產生所謂「視覺材料」的史料，就是將電影、電視影片、戲劇表演、圖像、繪畫、相片、留聲機、唱片、雕塑品、建築物、生產工具等等藝術品和實物，即文學性、藝術性、實用性的作品、物品，經過某種史料學的處理用作為社會史研究的材料。文學家張愛玲利用收藏家庭及個人照片，於1993年寫成《對照記——看老照片簿》，反映其祖父張佩綸以來的家族史及其個人的經歷，還涉及到乃祖堂侄清朝總督張人駿的家史，統觀也是一個大家族史的片段。²⁸ 她是文學家，寫作《對照記》未必有人文學者的將老照片當作史料來解讀的興趣，而近來似乎有了人文學者運用視覺材料進行歷史研究的預兆。洪惠冠總編的《竹塹思想起老照片說故事》第一、二輯，

21 李世瑜，《寶卷綜錄》，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61年。

22 王爾敏，《明清時代庶民文化生活》，臺北：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年。

23 王爾敏，《明清社會文化生態》，臺北：商務印書館，1997年。

24 王爾敏，〈《酬世錦囊》之內涵及其適用之人際網路〉，《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24期，1997年。上述王爾敏的研究，參閱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社會實錄·緒論》，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1年，頁13。

25 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社會實錄》，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1年。

26 吳蕙芳，《萬寶全書：明清時期的民間社會實錄》，王爾敏《序》，臺北：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1年。

27 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範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清史研究》2000年第4期。

28 張愛玲，《對照記——看老照片簿》，臺北：皇冠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



用老照片說明新竹移民史，講到村舍、人物、居民、街道、衛生、聘金、婦人會、醫療、工廠、學校、旅行、七仙女故事、地方名士踏春，甚至還有「老婆請警察管老公」的照片與解說。²⁹《臺北市老街道》、《臺北市老車站》等書，也是利用老照片製作的。臺北藝術大學的「臺灣老照片數位博物館」於1996年起，搜集1961年以前的臺灣老照片，三年來收集近三萬張，按內容分成十二類，設館展出，其「臺灣原味：生活館」，含有臺灣人的生活空間、臺灣人的生活情事、民俗生活及人像寫真四個展廳；「方園臺灣：地理資訊館」，展示大稻埕風華，有「去河邊散步」、「到街上逛逛」、「今天扮什麼戲」等單元。³⁰可見老照片運用的廣泛。近幾年，大陸學者對20世紀的老照片，分出年代，編寫不同時期的歷史，出版社競相出版。如《老蘇州·百年歷程》，以約一千幀照片，反映1895-2000年蘇州城市及居民生活的變化歷史。³¹老照片給讀者形象的、藝術的、直觀的讀物，它成了寶貴的史料。

史料，傳統的來源是歷史文獻，近代發展出考古發掘的實物材料，口述史學的訪問材料，田野調查的各種材料。社會史研究的出現，以新的概念與新的研究方向、領域，進一步擴大史料來源，將史學的邊緣史料和新的視覺材料收入史料庫，而對文學藝術作品、筆記小說的用作歷史資料，採取了大膽的態度，這都使社會史的史料來源得到大大的擴充，極大地豐富了社會史的研究素材。我們不妨將這些文藝的、視覺的材料，暫且名曰「另類」史料，說「另類」沒有任何貶義，姑名而已。如若嫌其不雅，或可謂為「非傳統史料」。

三、從社會史的視角對原有史料進行新的挖掘與詮釋

筆者擬從學者的具體研究及個人研究中的感受來說

明對這個問題的思考。筆者從一些學者的近期研究中，感到他們有傳統史料新解讀的研究成果，這裏僅以與生態環境觀念相聯繫的研究為例。研究宗族史的趙華富在90年代中期去安徽黟縣南屏村葉氏家族居地調查家族活動，對往日封山育林的族規及習俗大加贊揚，撰文云：「葉氏家族在老虎山有數十畝山場，古木參天，粗大合抱。山場立有界碑和禁牌，支丁只准拾枯枝，掃落葉燒火，嚴禁亂砍亂伐，違者，罰以錫箔將砍伐樹木燒化。由於對亂砍亂伐者嚴懲不貸，所以，山場保護良好，一片鬱鬱蔥蔥。武水橫流，繞南屏村東去。西幹橋和萬松橋立『養生溪』三字石碑，水中游魚只准垂釣，不准網打，如違，罰以錫箔將魚燒化，所以游魚安樂，柔游水中，沿溪可見，大者一二十斤重。」³²

看他如此富有感情的頌揚家族的保護生態環境，無疑是先自身有了這種環保意識。孫達人研究農民史，著作《中國農民變遷論》，講中國第一代農民，即三代宗法農民，是在良好的大自然環境下建設社會，第二代戰國秦漢「五口百畝之家」的個體農民，精耕細作進行農業生產。他的研究，體現出重視自然環境、生產力、交通等因素的特點。³³馮天瑜等撰著《中華文化史》，以大量的篇幅敘述生態環境及其與中華文化的關係，此書於1992年梓行，可知其作者敏銳的學術眼光，率先將環保意識貫徹於學術研究之中，³⁴從而搜集、使用相關的史料。

筆者在二十幾年前研究皖南棚民的經營方式史時，發現外省進入皖南山區的棚民與土著有衝突，官方支援土著，他們的理由，一是棚民開山種地，破壞了居民的祖墳風水；二是山林植被遭到破壞，水土流失，減少農田生產；三是河流因之堵塞，影響通航。那時筆者知道這是事實，有些道理，但寫作〈試論清代皖南富裕棚民的經營方式〉一文，³⁵並沒有寫進這個內容，因為當時階級論的影響很大，覺得棚民多數是窮苦勞動者，若

29 洪惠冠總編，《竹塹思想起 老照片說故事》第一、二輯，新竹縣文化中心，1995年版。

30 許素朱，〈「臺灣老照片數位博物館」建置機制之探討〉，漢學研究中心等主辦「地方文獻學術研討會」（2002年10月16-18日）論文。

31 徐剛毅主編，《老蘇州·百年歷程（1895-2000）》，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

32 趙華富，〈黟縣南屏葉氏調查報告〉，《'95安徽大學學術活動月論文選粹》，頁113。

33 孫達人，《中國農民變遷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年。

34 馮天瑜等，《中華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35 馮爾康，〈試論清代皖南富裕棚民的經營方式〉，《南開大學學報》1978年第2期。



寫他們的破壞性，豈不是「誣蔑勞動人民」，害怕這頂帽子，故而迴避了這種歷史事實。及至有了生態環境史的概念，將棚民的無序開山的事實同生態環境的破壞聯繫起來，對事情的認識進入另一個境界。與此相類似的是，過去閱讀族譜，看到一些家族的族規中，對族人到祖墳山上砍伐樹竹、折取樹枝，給予嚴厲的處罰，甚至連揀枯樹枝、割茅草也嚴格限定日期，不許亂來，那時將家族視作是族權的組織，對這些規定以為是族長的小題大做，用以鉗制族人。當有了保護生態環境意識之後，就將那些族規條例同保護生態環境聯繫思考，讀出一些道理。當 90 年代中期去江西進行家族史的田野調查，發現村民自覺保護水土，封山育林，認識到民眾的自覺性，同歷史傳統的關係，說明當初的有關族規是有其理由的，只是那時的族尊不會講保護生態環境的道理，只知訂立族規制約族人。生態環境史的概念，令筆者重新理解早期閱讀過的史書，認識有所提高。婦女史、兩性關係史、性別史的概念和研究方向的提出，使筆者在女性史的研究方面也有所改觀。「正史」中的《列女傳》，被前輩痛斥為奴役婦女的罪惡紀錄，不去認真閱讀，讀了也是從婦女受壓迫的角度去採擇一些材料，當有了兩性關係史的概念，筆者研究娼妓史予以運用，從男女兩方面來觀察娼妓出現及某些妓女受到某種尊重的原因，寫出〈古代著名淪落女子為何受褒揚〉；閱讀《清史稿》的《列女傳》，寫作〈清代節烈女子的精神世界〉，希望深入女子的精神世界，去認識她們的守節行為，對《列女傳》作出另一種解讀。身體史的概念的獲得，也令我在重新理解史料方面受益。80 年代前期筆者研究雍正皇帝的歷史，對他處理方士賈士芳一事頗為疑惑不解，因為他剛剛說賈士芳是異人，能治癒朕躬之病，不幾天又宣布其為左道妖人而予斬首，賈士芳的治病，用史料記載的雍正帝的話說是：「口頌經咒，並用手按摩之術」，「其調治朕躬也，安與不安，伊竟欲手操其柄，若不能出其範圍者」。筆者在《雍正傳》書中敘述了這些史料，對賈士芳究竟如何治療雍正帝疾病，未能作出任何說明，及至有了社會醫療史的概念，從引導術、安眠術、按摩術、人體特異功能的學術探討中獲取知識，猜測賈士芳試圖用這些方法給雍正帝治病，並要求患者的配合，可是皇帝哪能被人誘導，心理上承受不了，加之賈士芳可能功力有限，不能在短期內將雍正帝治好，而遭到殺身之禍，遂將這種看

法寫在一篇文章中。自知並沒有解決這一問題，但總算有了一種說法，比以前茫然不解要心安一點。

筆者觀察當前學術研究動向及個人的體會，深知因為運用者的新視角，不僅會發現新的史料領域，同時會對原先的史料產生新的領悟，進入新的意境，會凸顯史料內涵的另一個側面，做到較全面地理解，能夠用以解讀歷史現象，這同樣是挖掘新史料。

四、如何利用非傳統史書的史料

對非傳統史料，不能拿過來就用，必須進行史料學的處理，史料學的研究，以便提高對它的利用質量；同樣，對傳統史料的作社會史史料的理解，也要進行史料學的研究。筆者目前所能認識到的，在下述幾方面：

掌握大背景下的利用。所謂把握大背景，有兩重含義：對所研究的具體史事的歷史背景要非常熟悉，對來自史書的有關材料的充分掌握，在這種條件下，可能會胸有成竹地恰當地安排文藝的、史學邊緣材料的用場。為此需要先行閱讀、鑽研史書的材料，與此同時或稍後搜集這些「另類」資料；對這種材料本身進行研究，明瞭其產生的時代背景，作者創作的意圖、作品的藝術價值和社會意義，讓這些材料所反映的社會內容，與史書史料進行比照研究，解讀它的史學研究的價值，然後用作史料，可能會較為恰當，應當防止誤讀，使用不當，不能支援作者的論點，反而會產生負面作用。非傳統的史料零散在各種文獻、文書之中具有零散性；所反映的社會歷史的內容，又多是瑣碎的，片斷的，具有瑣碎性。這兩種特性，決定研究工作不能單純從搜集、閱讀這類資料開始，通常的情形還是以先掌握傳統史料為好。

有限度的審慎的利用。使用非傳統史料不可過多，一般不宜作為主要史料，史學論著的主體史料最好出自歷史編纂學的產物，利用非傳統史料與之配合，令兩種史料結合起來，以豐富的資料支援著作的論點論據。這裏說一般不宜作為主要史料，不是說所有的歷史著作都不可以把非傳統史料當作主要史料來用，要視著作的內容來定，比如研究民眾的居家生活，民居實物照片、建築遺址照片自然就會成為重要的史料來源，即使如此，仍應與文獻記載進行結合研究。非傳統史料尤其不能作孤證使用，因為正規史料都不允許，這類史料的利用更



宜審慎了。有限度的、審慎的使用，還包含不宜直接引用的意思，就是要對所引用的材料作出相應的說明。比如一度流行的電視連續劇《編輯部的故事》、《我愛我家》、《咱老百姓》、《東北一家人》中的故事情節、人物，自然不能作為真人真事，直接用作說明當前中國普通人的生活。

用作形象的說明，或研究過程的形象思維。閱讀非傳統史料，很能豐富研究者的形象思維能力，令研究者產生一些聯想，從而有利於研究的深入；文學作品、影視、照片、雕塑，是以造型感染讀者、觀眾，將它們用於社會史的著作中，當有助於對所描述的物件作出形象的說明，設若在著作中配上適量的各種類型的圖片，當能提高圖書的品質，收到圖文並茂的效果。不過在利用圖片時，一定要做到圖片與文字的緊密配合，天衣無縫，不能因圖片難找，勉強使用，反而會產生負面作用。

用新社會史的新概念去搜集、解釋材料，必須力求準確，在「準確」方面多下些功夫是絕對必要的，因為材料依然要考訂，解釋依然要反覆斟酌，尤其不可以新概念為滿足，以為已經跟上時代潮流，論著材料本身就很新鮮，就有成績可言。要求要比這個標準提高才好。

成功地利用非傳統史料，要求學者具備較高的學養。陳寅恪的以詩證史，是史學大家的手法，一般的研究者難於文史兼通，因之難於勝任。然而史學研究者需要知難而進，去改進、完善自家的知識結構，提高研究能力，尤其是青年學者，更應無所畏懼，以敏感及銳氣去嘗試、從事這類史料的運用。

五、重視傳統史書社會史史料的原因及其內容

從非傳統文獻中發掘社會史史料，固然為我們努力的方向，但傳統歷史文獻中的社會史史料同樣不能忽視，也要認識它的社會史史料的特點與價值，以利更有效地使用。對此筆者擬先說明各種文體的載籍的社會史史料特色，然後綜述它們的社會史史料價值。

（一）、《二十五史》中的社會史史料

《二十五史》作為正史，容易讓人誤解，以為它缺乏社會史的史料，恰恰相反，擁有社會史史料，為其應有之義，因其「紀傳」體體例，以「紀」為本，紀錄和頌揚皇帝的政治，以政事為主線，同時圍繞政事記載有關的經濟、文化制度、民族關係、中外關係，即用「傳」、「志」說明「紀」，這樣傳、志中必然會有大量的社會史史料。

《二十五史》社會史史料豐富，以社會史的概念去閱讀，會唾手可得，假如我們研究商人的社會身分，在《史記》、《漢書》中不難找到限制他們衣著、乘車及違反加稅的法規。前輩史學大家的社會史著作給後學樹立了運用《二十五史》史料的典範，如楊樹達的《漢代婚喪禮俗考》，³⁶其史料基本上選自《兩漢書》，而此書被譽為給史學開闢新途徑，即開創社會史研究。呂思勉的《中國婚姻制度小史》（1929）、《中國宗族制度小史》（1929）和四部斷代史——《先秦史》（1941）、《秦漢史》（1947）、《兩晉南北朝史》（1948）、《隋唐五代史》（1957）中的大量社會史內容，其基本史料，無不出自《二十五史》。由此可見，研究社會史，《二十五史》仍為重要史源，豈可忽視。

（二）禮制圖籍

古人生活在等級制度中，禮制是這種制度的倫理、觀念、生活行為準則的具體規範，禮制圖籍則是它的紀錄，它的這種性質，已將其社會史史料價值表露出來。

重要的禮制書籍有：《周禮》、《儀禮》、《禮記》（「三禮」），漢人應劭《漢官儀》，唐人蕭嵩等《大唐開元禮》，宋人鄭居中等《政和五禮新儀》，元人李好文《太常集禮》，明人宋濂等《洪武集禮》，清初官修《大清通禮》、《皇朝禮儀圖式》，光緒《大清會典圖》。清代道光間湖南巡撫吳榮光為在民間實現禮制，特地依據民情，著作《吾學錄初編》，以為民間遵行的規範。《會典圖》有禮儀、服飾圖式，有「形象的史料」參考價值。

36 楊樹達，《漢代婚喪禮俗考》，商務印書館，1933年。



（三）法制圖書

與禮制相配合的法律、法令，是對人們社會生活、行為準則的強制性規定。作為社會史史料運用的法制圖籍有兩大類，一是法律、法令本身的文獻，如《唐大詔令》、《宋大詔令》、《大明律》等；另一類是解釋法律的著作（包括案例彙編），主要的有《唐律疏議》、《通制條格》、《大元聖政國朝典章》（《元典章》）、《大誥三編》、《大清律例統纂集成》、《駁案彙編》、《讀例存疑》等。

（四）通論典制書

主要典籍為《十通》。《十通》中的禮、樂、戶口、宗廟、謚法、器服、氏族、災祥、蠲免諸類目的內容，集中反映人們的社會生活。

（五）荒政專書

荒政，係社會救濟事業的一種，荒政書反映各種災害降臨時的政府對策和社會對策及民眾的社會生活狀況。荒政書有宋人的《救荒活民書》，元人的《拯荒事略》，明人的《救荒事宜》，清人的《欽定康濟錄》、《荒政叢書》等。

（六）地方史志

方志，記載一方自然環境（自然現象、地面概貌、河流山脈、地下礦藏、氣候地震）、生產交換和人文歷史，體例包含志、傳、表、圖，與《二十五史》相近，可知為研究一個地方的全史資料，同樣為社會史研究提供極為可觀的素材，就從它重視自然環境的交待可以知道了。

地方史書，專記某一事物或某一類事物，如南朝宗懷《荊楚歲時記》，北宋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南宋周密《武林舊事》，明代沈榜《宛署雜記》，清代潘容陞《帝京歲時紀勝》，紀錄人們的衣食住行及節日、娛樂、社群生活，社會的風尚以及民諺俚語。還有專門的寺廟、道觀志書，反映僧道及信眾的生活。

（七）族譜

族譜，被梁啟超譽為「重要史料之一」，「我國家家鄉鄉皆有譜，實可謂史界瑰寶」，³⁷ 數量可觀，以萬計數，可見梁啟超所言不虛。

族譜是宗族、家庭及其與社會、政權的專門載籍，宗族史、家庭史的絕好史料集；地方史的不可或缺的資料，宗族與政權的互動關係史料；而且材料具有生動性、具體性。

家訓是人生規範之作，有的被編入文集，而收入族譜的更是數量浩繁。規範，是一種理想的體現，也是生活的寫照，研治社會生活史於此取材，是不可忽視的一個方面。

（八）筆記

種類多，僅《筆記小說大觀》一部叢書，收有筆記二百二十餘種。早期的有《博物志》，《世說新語》，《隋唐嘉話》，《雞肋篇》，《輟耕錄》，明清時代更多，如《萬曆野獲編》，《履園叢話》，不勝枚舉。史料生動、具體、細緻，常常為其他載籍所不能及。

（九）會要體史籍的社會史資料

會要體包含禮、樂、輿服、儀制、刑法、食貨、方域等類目，擁有社會史資料。主要作品有：《唐會要》、《宋會要輯稿》、《明會要》等。

（十）文集集中的社會史史料

文集數量巨大，今存元人文集約五百種，明人二三千種，清人數萬種。文集內容無所不包，社會史的史料自然豐富。

（十一）檔案文書

檔案文書主要是官文書，原來具有實踐價值，成為歷史文獻之後，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其中也有很多的社會生活史資料，即如「朱批諭旨」，除了政事內容，也有官員、民間生活的資料。刑事、民事案件的審判紀錄，現在已為學者利用作法律社會史的資料。許多紀錄

37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北京：中國書店，1985年，頁336。

社會生活的零散的文書，有的就為檔案館、圖書館收藏，成為富有價值的社會史史料。

（十二）關於女性的文獻

正史、政書、文集、方志、族譜、筆記各類圖書皆有婦女史料。專門書籍，有出自婦女之手的，如班昭《列女傳》，唐人侯莫陳邈妻鄭氏《女孝經》，明成祖皇后徐氏《內訓》；出自男性手筆的有《御定內則衍義》，《勝朝彤史拾遺記》，《教女遺規》；還有彙編關於女子史事的叢書，如《香艷叢書》；類書，如《奩史》。

（十三）類書中的社會史史料

類書採集各種圖書文獻的資料，包括社會史的材料，分類彙集，故各種資料較為集中，便利於閱覽，且因其將相關資料加以集中，閱讀時能收到便於思考的意外收穫。然而類書所收集的資料，均為第二手、第三手材料，利用時必須核對原書。

重要的類書有：《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冊府元龜》，《古今圖書集成》。後一書的《明倫編》尤多社會史資料。

（十四）近人編輯的社會史史料彙編

近人較有意識地進行社會史或社會史專題資料的彙編，採集歷史文獻的相關內容，分出綱目，編輯成冊；因為編輯目標明確，選擇的史料較為豐富，又較集中，頗便研究者的利用；係古人語錄式類書的發展，編輯水平大大前進了；這一類的圖書尚少，有待有心人費心去作，而學術之功不亞於研究性著作。

重要的圖籍有：徐珂輯：《清稗類鈔》；³⁸ 瞿宣穎輯《中國社會史料叢鈔》（甲集）；³⁹ 張海鵬、王廷元

主編的《明清徽商資料選編》。⁴⁰

（十五）外國人筆下的中國社會史史料

由於文化背景的差異，外國人觀察中國人的社會生活往往能夠捕捉某種特點；國人對自身生活的某些方面或細節，習以為常，不予紀錄，外國人的筆錄，倒能彌補這種缺憾；當然，文化背景的不同，加之有可能的曲解，從而影響其真實性的質量；外國人關於中國的紀錄，內容廣泛，不會是專門社會史的，只是包含這方面的內容。

涉及中國古代社會的外國人著作，有中亞人、西方人、東北亞人，影響較大的有《馬可波羅遊記》；⁴¹ 《利瑪竇中國札記》；⁴² 《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尚無中文譯本，日文譯出一部分；法人樊國樑《燕京開教略》；⁴³ 李氏朝鮮人的《漂海錄》，漢文撰寫；《李朝實錄》中關於中國的記載很多，吳輯成《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⁴⁴ 日人《韃靼漂流記》。⁴⁵

如果我們運用社會史，或者說新社會史、新史學的眼光，看待上述各種類型的載籍，便會發現：

第一，社會史史料非常豐富，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資料，雖然不是應有盡有，但是多少都能提供像樣的素材。以為某個研究課題完全沒有材料，那是不會的。

第二，社會史史料蘊藏在各種體裁的歷史文獻裏，每種文書有其特點，需要按照其特色去尋覓資料；每種文獻的特定體例，給我們認識的方便，換句話說，各種文獻的特定類目裏保存特定內容的資料，如族譜體例，往往有「恩綸錄」，紀錄宗族成員所獲得的皇家、官府文書——敕書、誥命、御制碑文等；「像贊」，收集先人遺物——畫像與贊詞、墨寶等；「宗規家訓」，輯錄家族的各種規章及對族人的要求，有族約、宗禁、家範、祖訓、譜例等；「世系」，家族成員的血緣世系關

38 徐珂輯，《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39 瞿宣穎輯，《中國社會史料叢鈔》（甲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

40 張海鵬、王廷元主編，《明清徽商資料選編》，合肥：黃山書社，1985年。

41 《馬可波羅遊記》，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

42 《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43 法人樊國樑，《燕京開教略》，北京教會，1905年。

44 吳晗輯，《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北京中華書局。

45 日人《韃靼漂流記》，中文譯本收入遼寧大學歷史系，於1977年出版的《清初史料叢刊》。



係，以表圖的形式說明；「世系錄」，記載族人履歷；「派語」，載入家族排行字語；「傳記」，反映族人的一善一行，形式有傳記、墓志銘、祭文、行述、壽序、年譜；「祠堂」，記載家廟的建築及其房地契；「墳塋」，紀錄祖墳狀況，它及祠堂，往往配有圖畫；「祠產」，宗族共有資產的紀錄；「先世考辨」，對宗族淵源、得姓始末的考證；「著述」，係先人著作的登錄；等等。《二十五史》中的〈食貨志〉、〈刑法志〉、〈禮志〉、〈五行志〉及人物傳記各自具有社會生活的規制及人生行為的資料，其中〈五行志〉的寫作，受儒家「天人感應」觀念的影響，寫了一些不好理解的東西，但是不乏反映人們社會生活的資料，如《晉書》〈五行志〉說西晉女子穿鞋的樣式，由圓頭改為方頭，表示女子由柔順

變為剛暴，預示惠帝賈皇后的專擅及西晉的滅亡。作者的寓意且不去管它，但這材料能夠說明女性鞋子式樣的變化和生活趣味。方志中的「祥異」、「災異」、「雜志」（多排列在書的末尾），對於社會史的研究尤有史料價值。總之，研究者需要什麼樣的材料，應到相關文種的相應類別中去尋找。

第三，社會史的材料分散在各類文書中，而且不像政治史有相對的集中，資料極其零散、瑣碎，這就給搜集資料帶來困難，認識這一點很重要，從而有思想準備，去進行艱苦的搜集，乃至不怕大海撈針。當然，由此想到社會史史料的彙編是極待進行的事情。現有的彙編太少，不能滿足研究的需要。彙編可以有多種類型，如社會史史料叢書，類書，專題史料彙編。

漢學研究中心新近出版品

朱子學的開展——學術篇

鍾彩鈞主編

內容為本中心舉辦「朱子學與東亞文明研討會」論文集。收錄朱子學研究在經典義理詮釋研究、朱子學與自然科學、朱子宗教思想等論文 11 篇。

臺灣地區定價新臺幣 350 元（含郵資）；其他地區定價美金 15 元（含海郵郵資）。

朱子學的開展——東亞篇

楊儒賓主編

內容為本中心舉辦「朱子學與東亞文明研討會」論文集。收錄朱子思想對福建、潮州、臺灣、韓國、日本等地的影響之論文 11 篇。

臺灣地區定價新臺幣 350 元（含郵資）；其他地區定價美金 15 元（含海郵郵資）。